

海外中国学

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

邓红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

邓
红 著

海外中国学

Riben de Yangmingxue yu Zhongguo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研究 / 邓红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海外中国学丛书)

ISBN 978-7-5598-0471-6

I. ①日… II. ①邓…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4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196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8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新民說

成为更好的人

《海外中国学丛书》编委会

主编：

李焯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

编委：

崔溶澈：韩国·高丽大学

Kenneth Dean(丁荷生)：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Benjamin Elman(艾尔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黎志刚：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Torbjorn Loden(罗多弼)：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

伍安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大木康：日本·东京大学

Paolo Santangelo(史华罗)：意大利·罗马大学

丛书总序

什么是“中国学”？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与海外学术界常见的三个名称——Sinology、Chinese Studies、China Studies——有着密切的关系。Sinology 一般被翻译为“汉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其中尤以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数百年的悠久历史，奠定了“汉学”研究的地位。过去的重点在传统的语、文、史、哲学问，“汉学”所牵涉的是传统经史诠释、文字训诂一类研究。

在亚洲地区或汉字文化圈，“汉学”同样是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其界定也有地域和国情之别。在日本，他们将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称为“汉学”(Kangaku)，而将自己本国的语言称为“国语”，研究自己母语的学系称“国文系”。在越南，历史上有一段颇长的时间使用汉字，中国的语文被称为“汉文”，河内的汉喃研究院便收藏了大量古代中国输入的汉籍及越南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献的汉文著作。而在大陆，对于中国传统学问之研究，则称为“国学”；在台湾，中文系也称“国文系”，道理是同样的。有些人认为汉学(Sinology)

是近年大陆流行的“国学”的前身,这其实是误解。“国学”是有关自己国家的学问,正如“国语”是指自己国家的语言,“国文”是指自己国家的文学,所以在中国本土,“国学”便指中国的传统学问。

但近年因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被称为“汉学”(Sinology)的传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变化,甚至被质疑其实用价值。为了摆脱其传统训诂考据的形象,海外有些学术机构开始舍弃带有古典意义的“Sinology”而改用范围更广和更具有现代意义的名称——“Chinese Studies”,虽然仍然以语、文、史、哲为主,但同时涉及近现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研究。针对汉学的现代发展,海外有些学者提出“新汉学”或“后汉学”的概念,颇有新意,但并未得到广泛的接受。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学术潮流的冲击,学术界近年兴起“中国学”(China Studies)的研究,有些学者甚至提出让“中国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立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中国学”是“汉学”式微以后在学术界日渐受到重视的领域,范围比“Sinology”“Chinese Studies”更为广泛。除了传统文字、文本的研究,中国学也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出版、信仰、性别研究或周边关系等领域,举凡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纵及古今,横跨中外,都可以是中国学的范围。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学只限于当代研究,其实并不尽然。从“汉学”到“中国学”,其转变关键,可谓有迹可循。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的语、文、史、哲,到走出传统,延伸到现当代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中国课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也突显人文学科面对时代变迁的挑战而迈向更多元的发展。

《海外中国学丛书》的出版,在于联络、组织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推介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作为中外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在中文已经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语言的当下,《海外中国学丛书》采用直接用中文书写的著作,以避免文字翻译的障碍。丛书的作者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在国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和熏陶,他们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视角和所利用的材料,反映了海外学者研

究中国课题的方法和心得。过去学术界常面对学科分类的局限,相关研究往往被割裂出互不相干的成果。《海外中国学丛书》鼓励多元视角和跨领域的研究,突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传统界限,从宏观的视野、崭新的角度去探讨中国研究,希望假以时日,集腋成裘,为中国学的建立贡献绵薄的力量。



新加坡国立大学
雲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

代 序

邓红教授虽小我十一岁,却是我的学长。我们都是改革开放以后考进武大的,他是77级历史系的学生,我是78级哲学系的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两个年级各班同学,彼此间年龄、经历差异很大,但相处都很融洽。当年邓红兄是我校足球队的球星,很活跃,与我们班的球星们交游,经常来哲学系的宿舍聊天。毕业后我们多年未见,后来知道他在国内工作一段时间后,负笈东洋,在日本求学,又在日本教书。他有时给业师萧蓬父先生通信求教,寄赠论著,深得恩师萧先生的赏识与器重,我也是从萧公处才知道他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同行。他定居日本后,曾回母校交流学术。2003年,应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中心吾妻重二教授的盛情邀请,我到位于大阪的该校做三个月的访问研究。邓红兄知道我很想拜访冈田武彦先生,便特邀我与内人去九州一游。承蒙邓红兄的陪同与安排,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当代圣贤冈田先生,与他老人家亲切交谈,如坐春风。

邓红兄深受日本学界,特别是九州学派的影响,有朴学之风,做

学问很扎实。他对汉代哲学下了很大的功夫,对王充、董仲舒的研究特别深透,发人之所未发,启人良多。近八九年以降,他通过翻译岛田虔次的著作,转向对王阳明的研究,对日本阳明学有真知灼见,厘清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习见。他对阳明后学邓豁渠《南询录》的整理与研究也有大的功劳,我在给博士生上课时,曾特别以此为例,强调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邓红兄曾受我之邀,多次回母校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使母校师生与会议学人特别受益。

从本书我们可以领略日本阳明学与日本中国学的来龙去脉及重要成果。对我们有冲击力的,是对某些习见据史料而“拨乱反正”。例如,邓红教授认为,“阳明学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乃是“日本阳明学”为了夸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权威而臆造出来的神话。“日本阳明学”本身是一场社会运动,但是被人取了“阳明学”这样一个类似于近代学术名词的名字,还添加上了各种学术包装,所以“日本阳明学”有许多令人生疑之处。本书上篇的几篇文章,正确区分把握“日本阳明学”这一社会运动和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之间的界限,彰显曾在世界阳明学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学界的阳明学研究成果。关于董仲舒研究也有一些迷雾,特别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说法。作者认为,这是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表述的不科学的概念,应改为比较准确精密的诸如“董仲舒对策的历史意义”“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之类的思想史命题来表述。在这一研究中,作者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有关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讨论,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本书对岛田虔次先生学术成就的评论深得我心。岛田先生与业师萧萧父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当年萧先生曾请在华中师大讲学的岛田先生来敝校做了一场讲座,之后两人鸿雁传书,有深度的学术交流。岛田先生有三部著作的中译,都是萧公安排师兄妹们译的。学兄徐水生教授曾到京都大学做过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萧公托水生教授代他去看望岛田先生。在下也曾得到岛田先生的提携,给他

提供了一些有关熊十力的材料,是托坂元弘子带给他的。岛田先生专门给晚生写来长信,讨论熊学。岛田先生的著作《熊十力与新儒家哲学》对在下最初的熊十力研究成果予以高度肯定与褒奖,并引用了很多处。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李焯然先生是世界知名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在明代思想史方面卓有建树。我与李教授也是多年老友,前年他曾邀我到该校讲演。李先生主持海外学者撰写《海外中国学丛书》,本书即是其中之一。邓红教授选择自己近期研究成果中的佳作汇集成本书,我认为十分难得的佳构。我有幸拜读了电子版,成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我从这部优秀著作中学到很多知识、见解、智慧与方法,深受启发。

是为序。

郭齐勇

2016年4月吉日于武昌珞珈山

自序

我是1987年去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留学的。记得当时九州大学规定参加硕士考试必须要有一名教授推荐,我只好写信回母校武汉大学历史系求救。武汉大学副校长、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吴于廑先生闻讯马上大笔一挥,手写了一封恳切的推荐信寄来,使我获得了考试资格。顺便说一句,九州大学是日本原七个帝国大学之一,我们四川老乡郭沫若先生的母校,他曾经上过课的九州大学医学部教学楼还依然矗立在医学部的校园里,《女神》就是在那里的教室写成的;他和安娜一家居住过的宿舍我们上学时还存在,离我租借的宿舍只有咫尺之遥。著名中国校友还有郭沫若的连襟陶晶荪(安娜妹夫)、夏衍等。

度过八年留学生活的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曾是日本阳明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涌现出了楠本正继、冈田武彦、荒木见悟、福田殖等著名阳明学大师。在校时曾亲耳聆听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先生的教诲,耳濡目染九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传统,翻阅收集了九州大学拥有的大量阳明学方面的资料;福田殖先生还是我的博士

论文副指导教师。

我1990年获文学硕士、199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哲学史专业),指导教师都是町田三郎先生。町田三郎先生1932年出生于群馬县前桥市,是日本战后研究先秦两汉思想的重要学者之一,毕业于日本东北大学,日本中国学实证主义学派金谷治先生的大弟子。曾历任日本东北大学教养部副教授、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纯真女子短期大学校长等职,并担任过日本九州中国学会会长。秦汉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秦汉思想史研究》(创文社,1983年)、《吕氏春秋译注》、《孙子译注》、《韩非子译注》等。

町田先生研究秦汉思想史,于是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王充的气论》,进入博士课程后开始研究日本学者很少涉猎的董仲舒,博士论文为《董仲舒思想研究》。博士论文在我博士毕业时同步出版,当时是日本第一本董仲舒研究专著,二十年后的今天也还是第一本。其中原因可参见拙著《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和中文版《董仲舒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的序言。博士毕业后的十几年,也还是在董仲舒、王充研究领域里爬梳,直到2008年翻译了岛田虔次著《中国思想史研究》一书后,才开始转向关注阳明学,主要是日本阳明学的研究。

町田先生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转而研究幕末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汉学的发展史,写下了《日本幕末以来之汉学家及其著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明治の青春》(续明治の漢学者たち,研文出版,2009年)等著作。记得1990年代初期,町田先生为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开设了日本汉学的讲座,主要讲授日本汉学的研究方法、资料收集渠道和古日语的阅读法。毕业后,其中几个来自台湾的留学生都成为台湾的日本汉学研究专家。我转向研究日本阳明学后,不懂的地方直接打电话或干脆驱车前往先生的住宅,直接受惠先生的耳提面命。

编写论文集写下如此回忆文字,不但是为了铭记感谢这些老师们的教诲和关怀,也想借此机会回顾自己在海外研究中国学的历程。

是为序。

邓 红

2016年4月吉日于日本大分

目 录

代 序

自 序

上篇 日本阳明学研究

何谓“日本阳明学” / 3

井上哲次郎的“日本阳明学”论 / 37

孙中山和“日本阳明学” / 52

梁启超和“日本阳明学” / 64

张君勱和“日本阳明学” / 82

朱谦之和“日本阳明学” / 105

岛田虔次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128

岛田虔次的阳明学研究心路和解释方法 / 135

岛田虔次的“中国近代思维挫折论” / 153

下篇 日本的中国研究

日本九州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传统 / 177

日本著名诗经专家目加田诚其人其事 / 188

日本的董仲舒否定论之批判 / 206

日本学术界关于“儒教国教化”的争论和教训 / 233

邓豁渠《南询录》的发现和回归故里 / 258

关于尊经阁藏崇祯本《梧州府志》 / 269

张之洞的政法顾问松平康国 / 280

西乡四郎和《武汉观战通信》 / 297

后 记 / 313

上 篇

日本阳明学研究